

「國家」與「帝國」

——「華南研究」與「新清史」對話的基礎何在

定宜莊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認真地將專號中的六篇文章讀完，感受到的是年輕一代學者的成長，也感受到老一輩學者面臨的挑戰。

文章開始之前，有個問題需要說明一下，這部專號取名「重探『帝國』與『地方社會』：『華南研究』與『新清史』的對話」，可知這幾位年輕學者在談到這兩個「學派」時的小心。確實，無論「華南學派」，還是「新清史」，皆從未承認過自己是一個「學派」，正如科大衛所說：「從來沒有過『華南學派』」^①，但我在行文中往往無法找到其它詞彙來表述它們，所以有時只好仍然沿用「學派」二字，如果引起質疑，還望諸位諒解。^②寫到這裡突然驚覺的是，無論「華南學派」還是「新清史」，儘管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改革開放之後方才出現的新潮流、新學派，但事實上，他們的主要學術成果和代表人物，以及他們在學界的影響，都已經屬於「老一輩」了。即

定宜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北京市建國內大街五號，郵政編碼：100732，電郵：13522658225@126.com。

- ① 參見孔雪，〈科大衛：從來沒有過「華南學派」〉，載《新京報》，2016年12月17日。
- ② 見趙世瑜，〈我與「華南學派」〉：「在大多數情況下，『華南學派』是學術界的朋友們對研究明清史、特別是區域社會史或歷史人類學的一批學者及其學術主張的一種稱呼。我從未聽到過這個學術群體的核心成員自稱『華南學派』，也很少聽到對他們的研究非常熟悉的國外學者在學術場合這樣講。他們自己曾用『華南研究』這個詞來描述自己的研究，當然，在不同的時期，也經常用『區域社會史』或『歷史人類學』等概念來指稱同樣的研究，因為『華南』只是其學術主張的早期試驗場。……我之所以在此仍使用這個概念（儘管打了引號），一是因為年輕朋友以此為題撰寫了博士論文，並有相關文章公開發表，我與『華南學派』的關係在這些學術史研究中有着不同的表述；二是因為在本文中，我回顧的主要是與這一群體中人的關係，而把與其學術主張的關係置於次要地位，所以不好用『我與華南研究』這個題目。」趙世瑜，〈我與「華南學派」〉，《文化學刊》，2015年，第10期，頁43-53。趙世瑜尚且這樣用，我再沿用也就不為過了。

以「新清史」來說，儘管關於它的激烈爭論是近些年才發生的，但從1996年何炳棣與羅斯基(Evelyn S. Rawski)那場爭論算起，也已經有二十多年。二三十年，將近一代人，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說，也到了後浪應該推前浪的時候了。

這個專號，據幾位作者說，旨在嘗試進行一場「華南學派」與「新清史」的深入對話，我既然不屬於這兩大學派，當然沒有能力、更沒有資格對這兩個學派進行任何批評、指點和概括，我能做的，只是作為局外人，在這裡寫下我的一些零零碎碎感想而已。

嚴格地說，這個命題本身很容易引起誤解。「華南研究」的學者們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異軍突起，成為中國史學界備受矚目的生力軍，數十年來他們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而且盡顯團隊合作的優勢，如今已成長為一株難以撼動的參天大樹。而「新清史」並非來自中國本土，只不過是20年前興起於美國等西方學界的一股潮流，將其稱作是近十年來美國比較有影響力的一種學術話語，也許更準確些。被歸之於這個學派的學者，其實從來都是各自為政，不僅相互間往來意見分歧、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公開聲明自己並不是「新清史」中的人物。可以說，他們當中並沒有哪個人能夠代表「新清史」，更沒有哪個人曾被他們封為「領軍人物」，這種種名稱，說是中國學界給他們戴上的帽子，恐怕並不為過。這樣形不成隊列的散兵游勇，又如何與陣容強大的「華南學派」抗衡？

再者，這幾位年輕的學者，很難說是歸屬於「華南研究」或者「新清史」的任何一派，雖然在這場對話中，他們是以「新清史」為基點而展開的，但事實上，他們有各自的老師，也各自接受不同路數的學術訓練，幾個人雖然打算一起與「華南研究」學者對話，我認為他們各自所代表的，還都只是自己而已。

當然，這絕非說這樣的對話就沒有意義，反之，惟其如此，這樣的對話，恐怕才更有意義。其意義就在於，不歸屬於哪個門派和陣營，不存在預先為自己設定的壁壘，也沒有要達到某種與功利沾邊的目的，只有這樣的討論和對話，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性。我也是以此為出發點，來看待這個專號和這幾位年輕學者的作品。

不為自己預先設定學術門派，並不意味着就沒有共同的學術旨趣和追求，這幾位年輕人並不諱言，他們是在「新清史」這個潮流的浸潤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近年來，國內學界對「新清史」的批評甚為激烈尖銳，其間雖然也出現了一些很有學術水準的文章，但總體來看，卻是意氣用事的多，學術性的批判少；吵架罵人的多，認真嚴肅的思考少。然而，多少帶點諷刺意

味的是，正當「新清史」在中國的清史學界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的態勢之下，接受了這個學派諸多影響的一代年輕學者，卻不聲不響地、靜悄悄地，在這十幾年的時間內成長起來了，這幾位年輕人，就正是他們中間一部份人的代表。他們雖然出身的國籍和地區不同，師承的路數不同，就讀的學校也不同，但在受到「新清史」的影響上卻有着突出的一致性，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這個專號的出版，毋寧被看作是他們的一個亮相、一種展示。這顯示了「新清史」在學術上的影響力和延續性，也說明了那些無的放矢的大批判，無論聲音多高亢，卻沒有對年輕一代造成實質性的影響，反倒是他們這種勢不可擋的發展趨勢，才是史學界當真應該認真對待的。

這裡無意詳談「新清史」，但有一點卻無法否認，那就是它對語言的強調給年輕學人的深刻影響。「新清史」強調使用滿語和其他少數民族（「新清史」將其稱為「非漢族群」）語言的重要性，認為充份利用滿文（蒙古文、藏文、察合臺文等）檔案，不僅僅是語言問題，更是以滿洲或其它「非漢族群」為主體進行研究的必要條件。儘管他們自己由於各種條件所限，並沒有幾個人能夠真正做到，但他們只是認識到卻未必有能力做到的這一點，卻被新一代的學者們做到了，除了比較熟練的掌握中、英文之外，他們幾乎都能夠利用一種甚至幾種「非漢族群」的語言，或查閱檔案，或從事田野。他們的研究就是從這裡起步的，這使他們從一開始就具有比老一輩學者更高的起點。

語言能力欠缺，是國內老一輩學人的短板，在我這一輩的和比我更老的一輩學者中（再再老的一輩卻往往中西兼通），對學習漢語之外的語言既不擅長，也不重視，甚至認為漢文史料多如牛毛，尚且讀不過來，人生有限，又何苦把寶貴的時間用在攻讀其它語言上。這也是很多批評「新清史」的學者，由於不懂英語，不可能閱讀「新清史」代表作的原文，導致其批評概念混淆甚至鬧出笑話的原因。

強調語言，當然不僅僅是為了回應「新清史」。史家歷來有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之說，挖掘史料及處理史料，正是史學研究的關鍵。史學研究每有大的進展突破，往往都是從新史料的發現開始。幾位年輕學者對多種語言的掌握，伴隨的是他們對史料的開拓，從這部專號就可看出，他們使用了多種以往學者從未涉獵過的檔案和文獻，例如邱源媛文章所利用的清代八旗人丁戶口冊、盧正恆文章所利用的《八旗滿洲世襲譜檔》、蔡偉傑文章所利用的烏蘭巴托與臺北的檔案館度藏的蒙漢文民間文書、孔令偉文章所利用的理藩院滿蒙文《題本》等。陳博翼則承襲「華南研究」學者的專長，熟練地運用族

譜、碑刻等文書，使研究打開了一個新局面。許臨君雖然是一位美國學者，漢語並非母語，但對方志、奏摺等文獻的利用卻讓人耳目一新。而這幾年年輕人對於各種民間文書（無論哪種語言）的重視和利用，顯然又汲取了「華南研究」之長，而且他們中有幾位，如陳博翼、盧正恆，本來就是在「華南研究」的學術訓練中成長起來的。

打開新局面的重要呈現，就是他們注意到在清朝這個「帝國」中，不僅有着大量使用非漢語言文字的地域（如孔令偉、蔡偉傑關注的蒙古、許臨君關注的新疆），就是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漢族居住的地區（如盧正恆關注的閩南、陳博翼關注的漳浦），乃至在「帝國」統治的中心（邱源媛關注的華北），也有着由滿洲這個「非漢族群」統治的政權無所不在的深刻影響。於是，在深入考察了清帝國統治的各個不同地區之後，他們便不約而同地、也是自然而然地將焦點投射到了對清朝這個「帝國」的理解之上。畢竟，傳統的漢人居住地域，無論歷史多麼深厚、文化多麼豐富多彩，卻只是這個「帝國」中的「之一」而不是「唯一」，這正是「新清史」帶給史學界的挑戰，只是上一代的「新清史」學者尚未及深入地方獲取地方經驗，因而無法將這個問題講述得更具體更透徹而已。

總之，「帝國」是「新清史」最關切的命題，而就「帝國」而談「帝國」已然不夠，他們有各自關切的地方，華北也好，華南也好，那麼這些地方的社會與「帝國」的關係，就成為他們認識「帝國」、了解「帝國」最重要的途徑，這幾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從點上，找到了諸多可以從「華南學派」的學者們學習、借鑒之處，並產生了進一步希望與「華南研究」學者對話的願望。因為如果我的理解沒有偏差的話，如何理解國家和地方的關係，如何將華南以及其它偏遠地區納入「國家」的體系，是「華南學派」多年來進行過深入探討並收穫了豐富成果的主題。

這裡想暫且離開這部專號的內容，針對「帝國」與「國家」的命題，略講得遠一些。「新清史」將清朝稱為「帝國」(empire)，^③是有嚴格定義和

③ 順帶說一下，這個 empire 是個並無任何褒貶之義的中性詞，「新清史」學者用它，不過是客觀地表述它的特徵而已。並不能將它與「帝國主義」等同。李治亭在〈「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一文中說「美國學者，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以帝國主義的觀點、帝國主義的眼光看待中國歷史，把『傳統』中國看作『帝國』，把清朝視為『清朝帝國主義』。在他們的言論與論著中，充斥着一股帝國主義的霸氣。為與20世紀的帝國主義史學相區別，故稱為『新帝國主義史學』。『新清史』就是它的一個活標本。」其實是李先生不識英文也不諳這些詞彙在英文中含義的表現。

限定的，那是他們立論的基礎，也是他們最費力要闡釋的內容。換句話說，「新清史」是針對清朝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進行的又一次對歷史主體的研究視角的轉換。而這種以滿洲人為歷史主體的變換，可以令人感受到以不同的話語所敘述的清史，乃至受它影響的整個中國近現代史，有着與傳統視角看到的清史的重要區別。如今「帝國」一詞為國內史學界多所詬病，甚至很多期刊書籍都不敢再用這詞，但這個詞既然是「新清史」的關鍵詞，這裡便不可避免。

同樣的，「國家」也是「華南研究」學者的立論基礎，他們所稱的「國家」，即 state，^④ 有更多政府和行政管理機構的含義在內，他們對這個概念的提出，也不是隨意為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由此出發，他們所說的「國家」，要比「新清史」特指清朝的「帝國」更為寬泛，與他們所研究的那個特定的地方社會相聯繫、相對應的「國家」也可能是清，但同時也可能是明，或是轉型中的民國。當然，清不僅包括在內，而且是佔據非常重比重的。「華南學派」中也有人特別關注並論述了在長時段中政權的變化以及政權變化導致的話語變化對於「國家」的影響，但他們更多還是從相對距中央遠一些的距離來看國家的統治，而且，對於地處偏遠的下層社會，這樣的變化是否有意義，又有什麼意義，「華南學派」對這個問題也貢獻過豐富的經驗和多層次的思考。^⑤

④ 試舉一例，科大衛《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一書的英文標題為：*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國家就用 state 表示的。

⑤ 對此，也許用「華南」學者自己的闡述可以說得更準確些。劉志偉在《在歷史中尋找中國》一書中提到：「我們的研究有一個很基本的認識，就是要從屬王朝秩序的『禮』如何在基層社會建構起一種國家形態來認識『中國原理』」（香港：大家良友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125）；程美寶在探討廣東文化觀的形成時關注的則是近代讀書人如何用地域文化來表達他們心目中的國家觀念，在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之間建立起辯證統一的關係（《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科大衛著有《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僅從書名即可看到，作者所闡述的主題是國家與宗族的關係，他認為「華南與王朝中央之間的正統紐帶，不僅建立於里甲與祀典之上，也建立在『宗族』這套語言之上」；而鄭振滿的論文集《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講的雖然是閩臺傳統社會，最後卻仍然落實到「探討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轉型」上。僅此數例，當然不能囊括「華南研究」的碩果累累，但他們對於國家與地方社會這個命題，引領了數十年的學術潮流，貢獻了太多的學術成果，積累了太多可資借鑒的經驗，給予了這些年輕人太多的啓示，則是毫無疑問的。

問題就這樣凸顯了。在「新清史」學者口中的「帝國」與「華南研究」學者所稱的「國家」，至少在一個重要的時間段也就是清朝時，指的是同一個實體，也就是「中國」，關鍵問題是，這個實體（中國）是否存在一致性呢？他們各自對這個問題多年來積累的經驗和收穫的成果，是否會對對方有啓發呢？

正是從這點出發，我認為「華南研究」與「新清史」的區別，不僅僅是「從下至上」或「自上而下」那麼簡單。^⑥我也是從這點出發，考慮「華南研究」與「新清史」的對話是否有可能性的。

如果從對「帝國」與「國家」的對比出發，兩個學派間可以對話的地方太多，可以由此伸展開來的內容（題目）也太廣闊太豐富了。譬如，「華南研究」多年來在田野工作中積累了無比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在清帝國統治的「非漢族群」居住的地區是否也可以借鑒呢？當政權變動的時候，譬如明清社會交替的時候，當明清各自祀奉的「正統」都已經改變的時候，地方社會怎樣回應、怎樣進行調整呢？不同族群構成的社會有不同的社會組織，即使同樣是「漢人」的社會也有不同的制度（如清朝時的漢人入旗成為旗人）這是「帝國」的特點，但研究這種種不同的時候，是否可以與「華南研究」學者對地方社會的研究中進行對比並從中受到某些啓發呢？而從另一方面說，當「華南研究」「走出華南」之後，如果所做課題未能離開清朝，是否也會與這樣一些問題發生碰撞呢？

我相信發生碰撞是好事，對於雙方也都能夠產生效應，其結果必然讓學界對朝廷、國家、帝國等最重要的概念和性質，有更深入一步的認識。這便是這部專號對學術研究的貢獻。

話說回來，年輕學者如果能帶着這些問題來向有着豐富地方經驗的「華南學派」學習和汲取，那麼，這場對話就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太有必要了。

「華南學派」儘管碩果累累，而且二三十年來隊伍不斷擴大，不斷有年輕學者加入進來，呈現着生機勃勃之勢，近年來更是大力提倡要「走出華南」，將影響擴大到華南之外各個領域的目的顯然。但無論他們採用的視角和方法有多大的突破和借鑒意義，清史學界尤其滿族史學界中的大多數人，

⑥ 歐立德(Mark C. Elliott)2016年5月25日在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演講時回應提問時說：「我注意到『新清史』的學派是用中央史料，從帝國角度看中央怎麼治理，而『華南學派』則是由下往上看，非漢民族利用國家制度進行漢化……對於這一點，上述兩個學派都沒有進行處理。」

卻始終認為這些與己無關，而鮮有關注和理睬。至於「華南學派」如何看待「新清史」，我不得而知，但至今很少見到他們在公開場合表過相關意見。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兩個學派的交流問題，但正如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在2016年的一次演講時回答學者提問時所說的：「新清史和華南學派方法和視角都很不一樣，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多少接觸，沒有人特意地去將兩者連在一起。」^⑦ 特意地將兩者連在一起，也許並無意義，但如果尋找到共同的話題並將其深入下去，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認為，如何認識清朝（乃至清亡之後的轉型）這個「國家」，就是這樣的共同話題。

還需特別提出的是，這些年輕人中有幾個，本來師從的就是「華南學派」，受到過「華南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正規、嚴格的訓練，從這樣的學術基礎上來探討兩大學派的關係，對於促進兩大學派的對話交流，尤為可貴。

交流、對話乃至爭論，是學術研究的生命，很高興看到年輕學者在深入探討問題上的執着與打破學術藩籬上的認真與勇氣，期待在這代年輕人的努力下，史學研究的面目能夠煥然一新，學術水準也能邁上一個更高的階梯。

（責任編輯：唐金英）

⑦ 參見歐立德，「歷史學與政治話語：關於新清史的反省與回應」(A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New Qing History)，2016年5月25日，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